

## 黃丕烈、顧千里交惡新論

劉 鵬

**內容提要：**黃丕烈和顧千里交惡，學界一般認為和嘉慶十二年至十三年段玉裁、顧千里之爭密切相關。實際上，黃顧絕交的深層次原因，乃是成長環境、性格稟賦上的巨大差異，以及年深日久的交往中，兩人因此產生的隔閡與裂痕。段顧之爭，祇是黃顧交惡的一個直接因素。

**關鍵詞：**黃丕烈 顧千里 交惡 原因

陳登原先生在《古今典籍聚散考》中將乾嘉間之藏書史，稱為“百宋一廬之時代”<sup>①</sup>。清中葉以後，“京師士大夫、南北收藏家，見有書為黃氏收藏，或有印記一二方，或有題識數十字，無不爭相購買”<sup>②</sup>。直至今日，黃丕烈仍然是世人眼中清代乃至古代藏書家的傑出代表，他的舊藏仍然是公私藏家汲汲以求的珍寶，他細大不捐卻娓娓道來的藏書題跋，更成為學術史和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文獻。

是什麼讓黃丕烈在二百年間，具有經久不衰的影響與魅力呢？除了個人的條件之外，友朋間的同氣相求、切磋琢磨，實是成就他名聲與地位的重要因素。他最重要的朋友可以分為兩大類，一類是如“藏書四友”（當代也習慣稱“乾嘉四大藏書家”）中另外三位周錫瓚、顧之逵、袁廷樞那樣的藏書家，他們相互通假秘笈，賞玩品評；一類是如錢大昕、段玉裁、顧千里這樣的著名學者，他們彼此辨章學術，考訂校讎。前者如衆星捧月，後者似錦上添花，使黃丕烈的影響，超出了單純的收藏領域，而兼具了旁人難以企及的深度與廣度。

在學者類的朋友中，顧千里是和他淵源最深的一位。他們兩人年相若（僅相差三歲）、地相邇（都居於蘇州，顧千里的從兄，是黃丕烈的密友顧之逵）、志相近（都有“抱殘守缺”的好古之志）、學相補（黃長於藏鑒，顧長於校勘），從乾隆末年至嘉慶前期的數年間，顧千里一度館於士禮居，切磋琢磨，賓主甚歡，黃丕烈百宋一廬的盛況逐漸形成，顧千里也聲名鵲起，並參與了《十三經》校勘等重要的學術活動。可以說，這段時間，是黃顧二人藏書和學術的黃金時期。

不幸的是，自嘉慶中期之後，黃顧二人蹤跡日疏，直至最終交惡。這其中的原因，不僅當事人沒有明言，甚至同時代的親友文字中也無一語以及。如此諱莫如深的做法，自然激起後人的疑惑和興趣。自清末至當代的多位學者如江標、王欣夫、趙詒琛、李慶、姚伯岳等，都在論著中對黃顧交惡的原因進行了探討，除江標將原因歸結為顧千里的“輕詆”之外，一般都將二人的絕交和段玉裁、顧千里為學術問題而產生齟齬，



直至嘉慶十三年（1808）矛盾激化聯繫在一起。

其中以李慶先生《顧千里研究》的觀點最有代表性：

筆者以為，千里與黃丕烈之交惡，其起因實與千里與段玉裁之爭執有密切關係……故段、顧之爭初起時，黃丕烈實處於一中間之地位。然其並未持平調和，予以斡旋，而是採取了一種偏段非顧的立場……黃氏的這種立場，顧千里當然不會不覺察。此乃是黃、顧交惡的原因所在。<sup>③</sup>

應該說，將黃顧交惡的原因歸結於嘉慶十二三年的段顧之爭，是不無道理的。但是，在筆者看來，相關問題仍然存在：第一，為什麼黃丕烈會在段顧之爭趨於白熱化的時候，“偏段非顧”，在給段玉裁的書信中將顧千里喻為“腦滿腸肥，初學執筆者”<sup>④</sup>，從而導致關係惡化？第二，嘉慶十四年段顧之爭日趨平靜之後，黃顧之間對彼此的態度有何異同及變化？第三，同時代的親友，對此事態度如何？黃顧絕交，對二人和後世造成了何等影響？這些都是前修未密，而本文試圖解答的問題。

## 一、交惡之因

筆者認為，段顧之爭，祇是黃顧交惡的一個導火索，或者說直接原因。兩人絕交的深層原因，則是成長環境、性格稟賦上的巨大差異，以及年深日久，兩人因此產生的隔閡與裂痕。

顧千里家境貧寒，志在“佐明時，利萬物”而屢試不第，身負“窮天人之學”而半生奔走，衣食仰給於人，自卑與自傲交戰，不免形成讀書人恃才傲物、不合時宜的性格。和他始終保持良好友誼的戈宙襄，嘉慶五年（1800）在其《半樹齋文》（清刻本）卷十《贈顧子遊序》中說：

顧子行端潔，性剛果，故出語恒觸人。醉後議事，尤中時要，而慢易人尤甚。即不慢人，習見者多徙席以辟。余之交顧子以此，而顧子之不合於世亦以此。……顧子於遊士之中下者，固奴蓄之；其上者，亦非眉目間人，遇之當必有揮斥。不則亦談笑置之，不與之同也，決矣；人見顧子之獨異而妒且恨也，又決矣。……顧子嘗相約曰：他日倘出仕，當上不負國，下不負民，終於不負所學而後止。若肥身家，保妻子，從時自媚，不危言危行者，共絕之！三人約誓歡甚，而非笑者已紛然起。三人厭聞其語，小不如意，亦嘗以詩酒凌藉人。甚則狂歌痛哭，傾駭一座。以是人皆目為狂。

這段話的評論部分，雖然充滿了友人間的“理解之同情”，但其中敘述的部分，則頗可見顧千里之性格。嘉慶九年（1803）秋，彭兆蓀在嘉慶十一年刻本《小謨觴館詩集》卷八《揚州郡齋雜詩二十五首》詩第十八首中，也微露規諷之意：

異書讎盡宿羅胸，奇士端應讓顧雍。亦是諸侯門下客，太阿秋水要藏鋒（顧澗菴廣圻同客郡齋）。



現代對黃顧文獻最為熟悉、編有《黃顧遺書》的王欣夫先生，也有這樣的評論：

澗蘋先生負才傲睨，盛氣凌人，與劉金門、段茂堂、黃薨圃、李尚之始甚相投，終乃絕交，人所共知。余藏先生手校書數種，於《經典釋文》則斥臧庸堂為“不識一字之庸妄人”；於《文選李注補正》則斥孫怡谷，一則曰“陋而無識”，再則曰“癡人說夢”。又有經韻樓刻《戴東原集》，亦先生批注，於茂堂校語及校勘記，大點密義，幾無完膚。雖不記年月，知其必絕交後所為也。他若吳山尊、嚴鐵橋亦均不合，時起齟齬。李申耆撰《墓誌》，言“詞色嫵煦”，恐非記實也。<sup>⑤</sup>

相較而言，黃丕烈家境富裕，二十六歲便在競爭激烈的江南鄉試中脫穎而出。衣食豐足而又少年得志，使他在會試失意後，進可以舉人大挑知縣，又捐貲為六部主事（六品）；退而能“抱殘守缺”，成就百宋一廬的盛事。他為人謙謹，恪守溫柔敦厚的儒者信條，甚至有時還有些多愁善感（這一點可以從他的許多題跋中窺見）。表兄石韞玉在清刻本《獨學廬四稿》卷五《秋清居士家傳》中，這樣說道：

君生有至性，克承家範，謹以持已，直以待人……性孝友，耐菴先生新喪，家人不戒於火，災及寢室，君據父襯不捨，誓以身殉，火亦不及，人以為孝思所感。兄承勳出為伯任達先生後，君承父產，與兄分受之。與朋友交，然諾必信，有善必贊，有過必規，多聞、直、諒三者兼之。

這些不應是親戚的虛譽，而是有充分的依據的事實，因為誓死守衛父親的靈寢，以及將家產分一半給已經過繼給伯父的“堂兄”，這都是大孝大義的粹然儒者之所為。民國編纂的《吳縣志》，列其於卷七十上《孝義傳》，主要依據的就是他“據棺大慟，誓以身殉”的事跡。而他一生除了與顧千里交惡之外，直到去世前仍門庭若市。如道光五年（1825）七夕，十餘位年青後進齊聚百宋一廬，題詠南宋陳氏書棚本《唐女郎魚玄機詩集》，可知他故交零落、藏書幾盡之後，仍能從年輕人那裏獲得尊敬。

如上所述，黃顧二人之間，存在着巨大的差異，反映在人際交往中，給人的印象也有極大不同。王國維先生在《藏書紀事詩》“顧廣圻澗蘋”條眉批中稱：

澗蘋無學識而善罵人，不如薨翁之坦率也。<sup>⑥</sup>

大約就是基於以上所述的緣故。

那麼，這樣的性格差異，又是如何一點點導致隔閡與裂痕的呢？

黃顧二人有據可查的交往，始於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）（《顧研》47頁），嘉慶元年（1796）至六年（1801），顧千里館於黃家（《顧研》47頁），賓主賞析疑義，鑒別群籍，最為相得。直至嘉慶十二年（1807），顧千里《復翁詩一首卅六韻》中，仍道“歸來見面為我泣，益信於翁是知己”，對於輕不許人、尤重知己的顧千里而言，這應該說是對彼此友誼莫大的肯定。但這期間，也有一些事件，可以看出二人，尤其是心思細膩的黃丕烈，一些微妙的心理變化：

#### 1. 《汪本〈隸釋〉刊誤》延誤出版

嘉慶二年（1801），黃丕烈偕顧千里作《汪本〈隸釋〉刊誤》一書，顧並於本年



十一月代黃作前後《序》，云“又何可不亟亟刊之”<sup>⑦</sup>。但遲至兩人交惡後多年的嘉慶二十一年（1816），此書始刻。而顧千里在絕交後跋康熙四十五年曹寅揚州使院刻本《隸續》二十一卷中（具體時間不詳），對此表達了強烈的不滿：

杭州汪氏合《隸釋》刻本，反於是而增多之葉，失之遠矣。向者欲各為刊誤，及《隸釋》纔畢，為某人乞索以去，遲久未刻，故《隸續》遂不更卒業。（《顧集》305、306頁）

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三年，汪日秀樓松書屋合刻宋人洪适的《隸釋》《隸續》兩部著作，嘉慶二年黃、顧二人作《汪本〈隸釋〉刊誤》，其後大約還有《汪本〈隸續〉刊誤》的計劃，但因前書遲遲未刻，而後書之作，遂亦告寢。在嘉慶二年至絕交長達十餘年的時間里，黃丕烈為何未能刊刻這部僅僅一卷、且前後序跋都已完成的《刊誤》，並招致顧千里的極大不滿？是否有原書刊刻未久，不欲明彰其失的考慮？此尚待深考。另外，這也是黃丕烈生前刊刻的唯一一部《刊誤》之作，大約糾人之謬，揚己之才，不大符合他的個性。

## 2. 顧千里“代購”、“居奇”

在嘉慶元年至六年的時間裏，顧千里除了作為塾師，佐黃丕烈校勘群書之外，還“借窗讀書”，並兼任訪書之職。應該說千里在古籍鑒定方面，此時於黃丕烈猶有過之，所以黃丕烈感歎“余所好之書，亦惟千里知之為最深。每遇奇秘本，為余所未見者，千里必代購以歸余。四五年來，插架中可備甲編之物，正不乏也”<sup>⑧</sup>。我們需要注意黃跋中的言外之意：顧千里並非由黃丕烈提供經費來“採購”，而是預先墊付書資式的“代購”——實際上即是低價買入，而高價轉售給黃丕烈。

嘉慶四年（1899）三月，黃丕烈從顧千里手中買到了舊抄本《建康實錄》二十卷。他在跋文中這樣寫道：

此舊鈔本《建康實錄》，吾友顧澗菴所藏書也。初，余於小讀書堆見抱沖用此本倩人影寫，詢是澗菴物，心欲之而未敢直陳也。既余於周香巖家見有宋本，澗菴屬余借校，澗菴謂余曰：“此書即從宋本寫出，特非影寫，故行款不同，復多脫誤爾。今得校勘，益臻美善矣。知君欲之已久，曷歸插架？”遂以遺余。其時適有友需余鈔本《咸淳臨安志》者，余獲直三十金，澗菴戲曰：“此書余亦欲獲半直。”余重其割愛意，即易之。昔抱沖及袁君綬階皆不過借鈔，而今竟歸之，且視鈔本更多校語，澗菴之厚余可謂至矣。

先是因此書屬顧而“未敢直陳”，再應顧之請借宋本校讎，使抄本價值更高，最後因其“戲言”，以十五兩白銀的重價購得，還要感歎顧氏“厚余可謂至矣”。我們不能不覺得，這實在是一種照顧朋友面子的說法。

嘉慶七年（1802）六月，從杭州阮元《十三經注疏》校書局返鄉的顧千里，先是以“元刊《呂氏春秋》、舊鈔《嚴氏詩緝》、明刻書《三史》《會要》”自黃丕烈處易白銀十二兩。隨後發生的事情，簡直是一場成功的營銷案例：

問此外可有好者，千里曰無矣，余亦信杭之果無好書。越一日，遇千里於金



聞書肆，聚談半日而別。將別去，復佇立於道，密語余曰：“有一書，銘心絕品，此書必當歸子，亦惟子乃能識此書，然鈔本須得刻本價。”問其名，始云為影宋鈔《韓非子》，所藏為錢遵王、季滄葦兩家，需直白金四十兩。余急欲睹其書，千里曰：“此書為汪啟淑家所散，而他姓得之，託余求售於子，故索重直。”余聞之喜甚，蓋子書中惟《管》《韓》為最少，余所收子書皆宋刻為多，惟《管》《韓》尚缺。《管子》猶見殘宋本，若《韓非子》並未聞世有宋本，今得影鈔者，豈不大快乎？床頭買書金盡，措諸友人所，始以三十金購之。全書之得見，遷延至數日，蓋千里亦愛不忍釋手矣。（《蕘識》255頁）

先是稱沒有好書，再忽然說有，又託名代售，索取重值，最後讓“書魔”黃丕烈故態復萌，竟不惜借貸購之。而實際情況卻如顧千里自道：“近日從新安汪啟淑秀峰家所謂開萬樓者賣出，遂於杭郡轉入余手，緣力不能蓄，復為蕘圃黃君捐三十白金取去。”（《顧集》321頁）

反反覆復的故技重施，已令黃丕烈心有不悅，雖然他仍在儘量維持一種朋友間的融洽氣氛。而因與同仁不和，已經離開杭州校書局的顧千里，嘉慶八年（1803）裏也在集中出讓藏書：

此明刻《中論》二冊，余友顧千里藏書也。重其明初刻，且為馮氏藏本，故以售余……遂以番錢二枚易之。同時有《越絕》《賈子新書》等，皆明初刻，而價各與此同。明刻書人知寶貴已如是，何況宋元哉。（《蕘識》248頁）

客歲友人顧千里遊杭州，歸為余言，有宋刻《茅亭客話》，係父姓物，索直五十金，且其書不輕示人也。余亦以一笑置之。今年千里既不為杭州之遊，余亦未與問及是書，秋初忽以是書來，畀易白金十八兩去。卷端鈐有顧澗蕘藏書印，知千里已藏之久矣。古書散落在他處，苟非有識者以為收羅，幾何不消歸烏有乎？蓋是書之在杭州，千里為余言之，而余不能得。余雖不能得，而千里仍為余得之者，千里之用心亦勤，余之獲福亦隨。其書之為人播弄耶，抑人之為書播弄耶？吾幾不得而知之。（《蕘識》468頁）

……請觀之，則延祐庚申刻《東坡樂府》也。其時需直卅金，余以囊澀，未及購取。後……因檢書一二種售之友人，得銀二十四金。千里猶不足，余力實無餘。復益以日本刻《簡齋集》，如前需數，而交易始成。（《蕘識》255頁）

被引為知己的朋友屢次欺騙、毫厘不讓，還能夠在巨細無遺的敘述中，曲為之說，黃丕烈的這份涵養，非常人可及。但“今年千里既不為杭州之遊，余亦未與問及是書，秋初忽以是書來，畀易白金十八兩去”這樣皮裡春秋式的敘述，讀者稍加留心，也自然可辨。

顧千里本是一位愛書的學者，他割愛善本的舉動，自然是維持生計的無奈之舉，本無可厚非；但將其出讓給一位寬厚的“知己”時那種囤積居奇式的商賈作風，卻實在令人感到不快。王國維在“何元錫敬祉”條的眉批中稱“夢華、澗蘋，皆以販書為生。蓋自何小山以後，風氣如此”<sup>⑨</sup>，也不是無的放矢。



### 3. 其餘之事

嘉慶五年（1800）五月，顧千里借周錫瓚所藏毛扆校本《說文解字》十五卷，在題跋中對段玉裁《汲古閣〈說文〉訂》的疏失有所批評，並署“時在王洗馬巷黃氏之思適寓齋”（《顧集》273頁）。周錫瓚與段玉裁交厚，顧跋中的文字非議，後來自然為段所知，而顧千里此時還是黃丕烈的塾師，並將很快由段玉裁推薦，赴杭州阮元《十三經》校書局。

嘉慶七年（1802）元月，顧千里在跋校本《經典釋文》三十卷時，稱臧庸堂“好變亂黑白”（《顧集》266頁）。

嘉慶九年（1804）十一月，顧千里批、跋孫志祖所撰《〈文選〉考異》，譏刺之語，滿目皆是<sup>⑩</sup>。王欣夫先生評云：

觀千里硃墨二筆，於怡谷盡情譏彈，咄咄逼人……千里跋此書於嘉慶九年甲子，距怡谷卒於六年辛酉不久。雖未知兆釁所由，而橫肆毒詈於身後，豈非厚德之累！嗟乎，千里校勘之業卓然千秋，而其褊衷利口，猶為人憎惡，況學問不如千里者乎？

嘉慶十年（1805），《百宋一廬賦》即將印行之際，顧千里在初印樣本上手跋云：

蕘翁手寫有別趣，但此君不曉楷法，美哉猶有憾。醉中記。<sup>⑪</sup>

嘉慶十年，顧千里自稱因“辨李銳之奸而為其見讎”（《顧集》325頁），與李銳絕交。

嘉慶十一年（1806）十二月，顧千里在跋黃丕烈所藏校本《蔡中郎文集》十卷《外傳》一卷時，更是言辭激烈：

書以彌古為彌善，可不待智者而後知矣。乃世間有一等人，其人蕘翁門下士也。必謂書無庸講本子。噫！將自欺耶，欺人耶？敢書此以質蕘翁。（《顧集》352頁）

此外，顧千里從兄、“藏書四友”之一的顧之逵於嘉慶二年（1797）去世後，作為生前摯友的黃丕烈，一直可以借觀其遺書，直至嘉慶九年（1804），他還自顧家借出宋本《駱賓王集》。可是至遲到嘉慶十二年（1807），他已無法再借，因為顧氏藏書已經“扃閉櫥中”（《蕘識》600頁）。但是顧千里則直到嘉慶末年仍可外借。親疏有別，顧之逵後人的做法自然無可厚非，但從嘉慶十二年前後的黃顧交往中，看不到任何黃丕烈託顧千里借書，或顧主動代借的記錄，而這在嘉慶初年的黃顧交往中，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了。

顧千里引發的這些事件，雖然不一定直接與黃丕烈相關，但與他為人處世的信條，可謂格格不入。耳聞目睹既久，一定也會悄然改變他對顧千里學行的看法。顧千里在《復翁詩》里將黃丕烈引為知己，但此時黃丕烈心目中，顧千里大約仍算是“同好”，但還是不是知己，就很難說了。



## 二、黃顧絕交

顧千里自嘉慶六年赴杭州阮元《十三經》校書局後，其性格中難以相處的一面逐漸顯露出來。因觀點分歧，先後與多位學者發生爭執。尤其是與當時漢學大家段玉裁的關係，逐漸惡化。段顧之爭的情形和原因，前人多有闡發，這裏不贅述<sup>⑫</sup>。

由於段、顧二人都是當時的一流學者，所論又各有得失，數番往還之後，又落入了學界商榷鬥氣勝於講理的窠臼，是以當時的學者，無人主動參與其中。而一向謹慎的黃丕烈，卻無意中捲入這場論爭，造成了他一生的某種遺憾。

在中國傳統的禮制和文化中，講究的是長幼尊卑，顧千里在年歲上是段玉裁的晚輩；在學術上雖未正式拜師，但實際上一度執弟子之禮，且在漢學的師承中，也屬後學；在學術生涯的開始階段，還多次受到段氏的稱譽和提攜。因此，當時的一般學者，縱然對二人高深的學問無可置喙，對顧千里這種“以小犯上”的行為，以及多篇論爭文章和信札中充盈的意氣和譏刺，恐怕也都不免有所側目。

嘉慶十二年至十三年，段顧之爭達到了高潮。段玉裁曾數次將自己的論點抄送給黃丕烈，並請他“與同輩觀之、評之”<sup>⑬</sup>，這裏所指的同輩，段玉裁點名者有許宗彥、戴敦元、江沅、李銳、臧庸等多人，其中如江沅、臧庸等，都是他的弟子。他不是通過自己的弟子向黃丕烈傳達個人觀點，而欲通過黃丕烈將己說播於衆口，讓一直置身事外的大家“評理”。一方面顯然說明他對黃丕烈人品、聲望的看重，另一方面，其實也未嘗沒有通過黃丕烈，向顧千里施加影響的意圖。

而黃丕烈對二人的爭執，顯然絕非“偏段非顧”，而一直是一種中立與調和的態度，雖然他和顧千里就此事的往還書信，迄今未見——這一點並不奇怪，如前所述，二人此時的關係，很難說還是知己，而顧千里的性格，也使黃丕烈很難說出公允而又不激怒對方的話。同時，黃丕烈答復段玉裁的書信——如果不是段玉裁主動將自己的文章和答辯書札交給黃丕烈，以黃的性格，很可能也會和同時代的其他同仁一樣，置身事外，絕不主動談論此事——也已難覓其蹤，但我們仍然可以在嘉慶十三年段玉裁《答黃紹武書》中所引的黃信部分原文，看出端倪。如他對二人論爭的態度：

先生與千里以說《禮》起爭端，某學問粗疏，未敢偏袒左右。

但同時，黃丕烈對於前輩段玉裁的殷殷期盼之意，也不得不有所回應，他在同一封回信中還說：

先生年高學邃，久已當代欽仰，千里以後起之雋與先生抗衡，同輩實所竊議。

這段話其實也沒有什麼問題，“同輩實所竊議”是可以想見的事實，而當着段玉裁的面稱顧千里為“後起之雋”，甚至有明貶暗褒，袒顧而非段之嫌呢。

不過，在《答黃紹武書》中，段玉裁的一段議論與“引用”雜糅的話，看起來很刺眼：

苟無志於學，用為爭名之具，是尚未能淺，又安能邃！愚雖陋，不至此也。



足下乃謂年高手硬、心意閑澹之老人，與腦滿腸肥、初學執筆者斷斷相爭乎哉！

後世的研究者，一般都會將“腦滿腸肥、初學執筆者”作為黃丕烈在背後對顧千里的污蔑，並以此作為黃顧交惡的關鍵。或許顧千里在看到這段話時，會有一種被友人出賣之感，但我們在無法看到黃丕烈原信，無法據上下文分析語意的情況下，卻很難說這是黃丕烈對顧千里的評價，甚至很難說這就是黃丕烈說過的話。

其一，如果這句話是黃丕烈所說，與前文他“未敢偏袒左右”、視顧為“後起之雋”的話完全矛盾。最牽強的分析，就是這句話完全是一種比喻，是黃對段、顧二人年輩、地位狀態的誇張對比，意在勸段不應與顧一般見識。其動機仍是好的。

其二，如果將“乃謂”解釋為“難道認為”，和後面的“乎哉”構成反問語氣，聯繫前後文，將這句話當成段玉裁自己所作的比喻，似乎更為恰當：“假如有人無心向學，而只是將學問當成爭名逐利的工具，那他的學問連淺薄都稱不上，哪裏還能說深邃呢？我段玉裁雖然淺陋也不至於到這種地步。您難道認為一個年高手硬、心意閑澹的老人，會去和一個懵懵懂懂、初入學問門徑的年輕人去斤斤計較這點虛名嗎？”若如此解釋可通，說黃丕烈對顧千里“污蔑”，顯見證據不足。

在艱難的周旋於兩家之際，黃丕烈仍同時與顧千里保持一種正常的交往，而顧千里亦同時助其校刻《焦氏易林》十六卷，這一點，黃、顧二家的年譜可以為證。

但段玉裁認為黃丕烈所恐懼的“佐門之傷”仍然還是來了。自嘉慶十四年起，黃顧二人的交往，戛然而止。我們可以按年來排比兩人絕交後各自的言行，以及其中一些微妙的聯繫。

#### 1. 嘉慶十四年（1809）

黃跋影宋鈔本《張說之文集》十卷云：

歲入己巳，諸事擾心，舉向日聚書之樂，委諸度外。即自問，亦不知何以若是之落寞也。（《蕘識》512頁）

或者黃氏落寞的原因，即與顧千里有關。還有一個學界較少注意的例證，嘉慶二十年，黃丕烈《宋嚴州本儀禮經注精校重雕緣起》云：

歲丁卯，古餘又屬影鈔經注本，將以付刊，既而調任吉安，札致余曰：俟鈔竣，即交伊友收存。如言交去。越歲戊辰，伊友云，古餘謂吳門有好事者如欲刻之，當舉以贈。遂從伊友處次第取刻之，未及半而靳不與。（《蕘識》879頁）

戊辰即嘉慶十三年，“未及半而靳不與”的時間，也約在十四年以後。此後的數年，顧跋中絕無黃丕烈之名，黃跋中，卻偶有顧千里的身影出現，玩其文意，卻非絕交之辭。

本年七月，王小梧售宋刻《詳注周美成詞片玉集》十卷於黃丕烈，王事先請顧千里鑒定，顧云其為宋刻，且“精妙絕倫”，黃最終以足紋銀二十兩得之，交易過程黃顧二人未謀面（《蕘識》840、841頁）。

本年，陳鱣欲調和段顧之爭而未果（《顧研》135頁）。這一結果也可以想見，一方面段顧二人論戰正酣，意氣正盛，難以聽得進旁人的勸解；另一方面陳鱣的聲望、



和兩人的交誼，尚在薨圃之下，更無力承擔這一重任。

## 2. 嘉慶十五年（1810）

臘月廿八日，黃丕烈跋影宋鈔本《駱賓王文集》十卷，云“雖千里、壽階各有影鈔本，總不及此本之精”（《薨識》511頁）。

## 3. 嘉慶十七年（1812）

歲暮，黃丕烈跋校元本《韓詩外傳》十卷，云昔時西賓陸東蘿“與澗蘋居相近，交亦密，故校書事亦頗勤”（《薨識》20頁）。

本年秋，黃丕烈重刻宋本《輿地廣記》三十八卷成。

## 4. 嘉慶十八年（1813）

四月十八日，黃丕烈跋宋本《嘉祐集》五卷云：“宋本作‘數月’，顧千里以為不可解，借余校本識後語。與此宋本對，‘數月’二字作‘年’。”（《薨識》608頁）

而五月廿六日跋舊抄本《嵇康集》十卷云：“是書余用別本手校副本備閱，於丁卯歲為舊時西賓顧某借去，久假不歸，遂致案頭無副，殊為可惜。”（《薨識》608頁）稱“顧某”而不名，此時黃對顧，始漸有微詞。

十月十五日，跋明刻本《華陽國志》十二卷云：“癸酉秋，書友自金陵歸，攜示此本，謂較諸本為勝。余曰：爾何足以知此，是必有所受之也。因舉澗蘋所屬為對。……遂收而重裝之。”黃顧絕交後，顧千里託書商將自己的藏書高價賣給黃丕烈，但被黃一語點破。這其中有一種可能，即顧氏採用這樣的手段，很可能已不是一次兩次。（《薨識》134、135頁）

## 5. 嘉慶十九年（1814）

二月，黃丕烈跋影宋鈔本《虛齋樂府》二卷，追憶嘉慶二年事云：“先是書友攜來，索重直，余因有錢遵王家鈔本，遂屬顧千里手校其佳處而還之。”（《薨識》850頁）

## 6. 嘉慶二十年（1815）

春，黃丕烈作《宋嚴州本儀禮經注精校重雕緣起》，言及顧千里，始終用“伊（張敦仁）友”代稱，對顧在刻書中途拒絕提供所需的影鈔葉，不滿溢於言表。（《薨識》879頁）

## 7. 嘉慶廿一年（1816）

六月，黃丕烈跋宋刻本《禮記鄭氏注》存九卷云：“陽城張古餘守江寧，介抱沖從弟千里影寫付刊，外間頗多傳播。惜千里作考證，未及將抱沖所歸顧懷芳家殘宋本、余家所藏殘宋本一取證耳。”（《薨識》38頁）

## 8. 嘉慶廿二年（1817）

本年，李銳卒，顧千里挽之曰：“人有千算。”李銳精於算學，故稱其“人有千算”，但這句話背後的“天祇一算”，卻似乎對李氏之死，抱一種幸災樂禍的態度，故同人為之齒冷<sup>⑭</sup>。

## 9. 嘉慶廿三年（1818）

元旦，黃丕烈跋影宋鈔本《駱賓王文集》十卷：“小讀書堆本，澗蘋影鈔之，以貽



秦敦父太史，於嘉慶丙子開雕，昨歲大除始得寓目。刻板雖精，字句已有移易矣。”（《蕘識》511頁）

#### 10. 嘉慶廿五年（1820）

七月，顧千里自汪士鐘處借得黃丕烈舊藏宋刻本《輿地廣記》三十八卷，並對嘉慶十七年黃氏據宋刻所刻《輿地廣記》及校勘記，大加撻伐。雖未點名，但言“與《札記》所言者十有七八不合……夫彼何以如是之用心，我則弗能知……吾願汪君據此之真，顯彼之偽”，語氣已極重了。約同時，顧千里作《校勘〈輿地廣記〉札記》二卷，稱士禮居刻本“妄人憑顧臆定此意見”、“單看不覺其荒謬，借到底本一覆，其病萬端。甚矣下筆之難也”（《顧集》293、294頁）。

對黃丕烈的批評如此，對段玉裁，顧千里文中卻有回轉之意：本年四月，顧作《人壽金鑒序》云：“曩識金壇段茂翁，述其師戴東原之言曰：‘釋氏之教，謂人生百年，但如泡影，必脩至歷劫不壞，乃為有以自立。我儒不然也，就此百年之中，求其所謂立德、立功、立言者，自足以不朽而無俟餘求矣。’予聞而韙之。”（《顧集》201、202頁）此時段玉裁已經去世，但對於已去世之論敵，也勇為身後之謗，這本是顧千里的一貫作風，而在文章開頭徵引昔日論敵之語，並予以肯定，這對於顧氏而言，是很少見的。所以這種徵引，是否意味着顧對於段的某些論點，已經有所接受？這不是本文的重點，尚俟別文考之。

#### 11. 道光二年（1822）

五月，黃丕烈跋校本《廣韻》五卷云：“道光壬午仲夏，坊友以李子仙手臨顧澗菴所錄惠松崖、段若膺兩先生校定本《廣韻》示余……段、李皆作古人，澗菴又交絕，無可訪問矣。”（《蕘識》69頁）這是黃顧二人現存文獻中唯一一次對於“絕交”的確認。但黃丕烈此時對於“交絕”的心理，已經完全是遺憾和故交零落的淒楚了。

而顧千里閏三月所作《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序》，對汪士鐘宋元本的重要來源黃丕烈，一語未及（《顧集》192頁）。

#### 12. 道光四年（1824）

二月，黃丕烈於明刻本《博雅》十卷跋云：“因思向時顧千里館余家，為余校書……茲之所校，於影宋本佳字固無一遺。就千里所記，悉為表明。”（《蕘識》62頁）這一年黃丕烈已經六十二歲，對往事和故交的回憶，是垂老之人的習慣，而他的生命，也於第二年八月，走到了盡頭。目前未見顧千里的悼挽文字。

#### 13. 道光七年（1827）

本年冬，顧千里跋藝芸書舍刻本《郡齋讀書志》二十卷云：“小學類顛倒錯亂，當分六段移轉……丁亥冬日，粗閱一過，黃、李瞽說，無非無事取鬧，至於確鑿轉寫之訛者，則又茫然莫辨也，可笑可憐而已！”（《顧集》300頁）

嘉慶廿四年，李富孫為汪士鐘以各本校勘袁廷樞舊藏、顧千里校跋衢抄本《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》二十卷，以備刊行，刻本前有李《校衢抄本〈讀書志〉跋》云：

頃寓吳門，獲與汪閬源觀察交。觀察好古嗜書，儲藏日富，茲以顧君澗菴所鈔衢本屬校。烏馬陶陰，錯脫處至不可讀。兼書目、別集兩類，奪去一百餘種。



錢詹事《養新錄》言瞿君中溶購得鈔白衢本，以惜無好事刊行之。此書近歸黃蕘圃主事處，復假得讎勘。

顧千里對李富孫的批評予以反駁，本無可厚非，言辭激烈本是他的習慣。但黃丕烈在汪士鐘刊行此書的過程中，雖然曾經借出藏本並佐校勘，卻並未對顧校置一辭，被顧千里捎上一起“可笑可憐”一番，實在是俗語所稱的“躺着中槍”。

同年，顧千里為張月霄作《愛日精廬藏書志序》，言“書之難聚而易散”，點出顧之逵、袁廷樞等人，對黃丕烈一語未及（《顧集》190、191頁）。

#### 14. 道光十年（1830）

九月，顧千里代汪士鐘作《重刻宋本儀禮疏序》，稱宋刻殘本“嘉慶初，入吾郡黃氏”（《顧集》129頁），這也是言及黃丕烈時，少見的中性敘述，但也明顯可以看出其對昔日的密友，仍心存隔閡。

從上面的梳理可以看出，黃顧交惡之後，顧對黃的態度，始終是避而不談，到後期還有惡化趨勢；而顧千里則一次次的在黃跋中出現，而且除了嘉慶十八年和二十年有過兩次微詞外，基本上都是以一種中性或懷念、惋惜的態度提及的。另外我們還會發現，假如黃顧交惡真的完全只是因為段顧論爭之故，嘉慶十四年後的幾年，應該是黃顧關係最為緊張的時期，但我們卻沒有看到相關的跡象，這是與沒有排比文獻之前的印象完全不同的。

另外需要說明的是，道光九年己丑（1829）十一月舊鈔殘本《中菴詩》十一卷顧跋云：“右殘本《中庵集》十一卷……後為黃君蕘圃所得，復為校正數字……今缺上七卷下二卷，蕘翁收時已如此矣……己丑十一月初一日，顧廣圻書。”（《顧集》369、370頁）此處“黃君蕘圃”、“蕘翁”這樣親密稱呼的出現頗耐人尋味，但因其與道光九年前後顧千里對黃丕烈的整體態度有所抵牾，故“己丑”這一干支是否準確，仍應存疑。

### 三、時人態度及影響

黃顧從交惡到絕交，雖然有段顧論爭這個誘發因素，但實際上有一個長達數年的過程。雖然同時代的當事者們，並沒有留下文字來說出個誰是誰非，但從他們的行為，也可以看出對於這場事件的態度。

與二人關係最密的“藏書四友”中，顧千里從兄，黃丕烈引為知己、慷慨大方的顧之逵，去世於嘉慶二年（1797）。黃丕烈的親家、顧千里的密友袁廷樞，在嘉慶中期家境敗落，奔走謀衣食於江浙間，恰於嘉慶十四年（1809）八月黃顧交惡初起時病逝。他二人本是最適合的人選，卻陰差陽錯的沒有機會居中調停。周錫瓚的年紀長於黃顧約二十歲，嘉慶十四年前和顧千里的交往就並不多，之後的交往記錄則幾乎沒有。而他與黃丕烈，則一直頗有往還。

細審黃顧題跋及年譜可知：嘉慶十四年後，鈕樹玉、陳鱣、瞿中溶、孫星衍、鮑廷博、李福等其餘的共同朋友，則同時與二人保持較好的友誼。這一方面是兩不得罪



的人之常情，另一方面，也可以看出他們對二人的交惡，並沒有明顯的傾向性，對各自的立場和性格都有所理解。

其實，嘉慶十四年後，黃顧二人各自的境況，和之前變化並不大。黃丕烈雖然因購書和家庭變故，晚年經濟上有時出現一些困難，陸續開始出讓宋元舊本，但他仍然可以算是衣食無憂的小康之家，親事校讎之外，時不時的可以去訪訪天平山吾與庵的寒石和尚，或者與石韞玉、潘奕雋、彭蘊章等人詩酒唱和，除了出遊、弔友之外，很少離開蘇州，可以說仍算得上悠哉悠哉。而顧千里仍不時為衣食奔走於揚州、江寧等地，為孫星衍、秦恩復、胡克家、鮑廷博、廖寅、汪喜孫、《全唐文》館、吳山尊、王引之、洪瑩等校、刻書籍，病困以終。

其實，嘉慶十三年後的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二十、廿一、廿二、廿三、廿四，道光元年、二年、三年、四年，黃丕烈都曾刊刻書籍<sup>⑤</sup>，累計達20種（黃氏一生刊行書籍約28種）114卷。二人如不絕交，總校刊之役的無二人選，必然是顧千里。如此黃顧合璧，自然會成就藏書和刻書史上空前絕後的輝煌。

當然，歷史是無法假設的，正如我們無法給黃顧交惡“歸責”一樣——如前所述，黃顧二人，有着巨大的性格、家境差異，但他們仍在數年的親密合作中，給後人留下了眾多珍貴的文化遺產。時至今日，學界仍習慣將“黃顧”並稱，“黃跋顧校（批）”，仍是人所共知的球璧之珍。

同時，黃顧交惡這段令人遺憾的歷史，除了讓我們發出喟歎之外，也值得當代的學者深思。

#### 注釋：

- ① 陳登原：《古今典籍聚散考》，上海書店，1983年，341頁。
- ② 葉德輝語。“國立中央圖書館”特藏組《標點善本題跋集錄》，1992年，670、671頁。
- ③ 李慶：《顧千里研究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，132—134頁。以下省稱《顧研》。
- ④⑬《答黃紹武書》。段玉裁撰、鍾敬華點校《經韻樓集》卷十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年，332頁。
- ⑤ 趙詒琛：《顧千里先生年譜》卷下，民國《對樹書屋叢書》本。
- ⑥⑨ 魏文峰：《北圖所藏〈藏書紀事詩〉王國維批語輯錄》，《文獻》1988年第3期。
- ⑦ 顧千里：《顧千里集》，中華書局，2007年，194—196頁。以下省稱《顧集》。
- ⑧ 黃丕烈撰，屠友祥注：《菴圃藏書題識》，上海遠東出版社，1999年，254—255頁。以下省稱《菴識》。
- ⑩ 王欣夫：《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，1408—1411頁。
- ⑪ 江標撰，王欣夫補：《黃丕烈年譜》，中華書局，1988年，83頁。以下省稱《黃譜》。
- ⑫ 關於段顧爭論的始末，一般文獻學研究論著中多有涉及。另可參見漆永祥《論段、顧之爭對乾嘉校勘學的影響》，《古籍整理研究學刊》1991年第3期；鍾雅瓊《不校校之還是斷以義理——論段玉裁與顧廣圻之爭》，《西昌學院學報·社會科學版》2011年第2期。
- ⑭《黃丕烈年譜》83頁云：“標按：千里於至交而斷絕者，今又得一人矣。所謂造作文字相詆毀者，聞尙之故後，千里挽以‘人有千算’四字”。清道光顧閻年譜合刻本《閻潛丘先生年譜》卷四云：“千里天性輕薄，於生平師事之段茂堂，一旦論學不合，輒痛加詬厲，無復弟子之禮……於總引至



交之李尚之，其歿也，又造作文字，重相詆毀。顧吳羹通政嘗述其事而太息曰：‘不意千里之待亡友也如此。’”

⑮ 姚伯岳：《黃丕烈評傳》，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8年，216、217頁。

作者單位：國家圖書館研究院